

王 副 编  
主 部 任  
编 部 主  
辑 部 任  
主 夏 锦 乾  
副 尹 庆 红  
任 张 蕴 艳  
于 贾 安 琦  
张 永 浩  
陈 永 宁  
龙 珠 绿  
多 婧  
杰

英文编辑

秦宇环

Research on Marxist Research

#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17卷 | 第1期

2014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凯文·安德森 / 美国加州大学  
戴木柱 译

——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的一种批判性阅读

【内容提要】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自问世以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马尔库塞的这本书是极具开拓性的，它通过系统考察黑格尔的著作以及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复活了作为激进社会理论基础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为解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提供了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案。

【关键词】黑格尔；理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

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自1941年问世以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从我的观点来看，马尔库塞的这本《理性与革命》是极具开拓性的，它通过系统考察黑格尔的著作以及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复活了作为激进社会理论基础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在书中也猛烈抨击了作为技术时代和工具理性的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尤为重要的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创性解读，主要表现在对“否定性”概念的理解上，这一概念是理解作为批判的、革命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钥匙；最后，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详细讨论，在当时也是领一时之先。马尔库塞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提供了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案。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个经典文本。

凯文·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社会学教授，研究兴趣在于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及女性主义研究。现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新论集》历史考订版 (MEGA2) 国际编委。  
本文选自 *Sociological Theory* 11: 3 (November 1993)。本文的中文翻译与编辑由译者授权戴木柱完成，有所增删。在原文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译者对论文内容进行了再创造，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译者负责。

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

## 一、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的原创性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有几个重要的文本,一是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二是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年),三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61年)。历经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在19世纪被欧洲主流思想界当作“死狗”一样对待的、保守的、毫无生气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黑格尔,在20世纪却奇迹般地以激进的、革命的、批判的思想家面目被各式各样的左派思想家所复活,如卢卡奇、马尔库塞、杜娜叶夫斯卡娅等等诸君。这也许是因为,在纳粹主义肆虐的悲剧性年代里,人们声称黑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原谅的理论共谋关系;也或许是因为,沿着启蒙运动的航线一路前行的理性之船,竟然化身为一艘精密科学设计的生产流水线与焚尸炉,而无论是流水线还是焚尸炉,显然都不是自由理念的羽化之地。

在《理性与革命》的开篇,马尔库塞明确表示,此书的三个主题,一是澄清人们对黑格尔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暧昧理论关系的误解,二是探讨黑格尔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我的观点来看,马尔库塞通过研究黑格尔的三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与《法哲学原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批判的、革命的、辩证的理性概念;同时,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完整考察,马尔库塞在理性——这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最重要的遗产——与革命(依赖于一个激进的主体概念,在本书中,这个激进主体便是无产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激进社会理论。

从思想史上看,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兴起的社会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杜克海姆奠基而成。以我的观点,尽管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学理论的支撑背景,但是很不幸,在社会学的理论圈内,弥漫着一片对黑格尔的敌意,甚至把黑格尔当作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立面来看待。在杜克海姆1897年《论自杀》一书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科学比任何辩证观点更能发现现实规律”<sup>①</sup>。以杜克海姆的观点,黑格尔主义包含了一种过时的、前科学的理论。社会学的另一位大家,马克斯·韦伯在1909年一封未发表的书信中也这样写道:“对待事物的两种方法:黑格尔的,或我们的”<sup>②</sup>。

<sup>①</sup> Durkheim, Emile, *Suicide*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p. 37.

<sup>②</sup> 转引自 Braun, H. H., *Scholar, Values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s Methodology*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72), p. 39.

由此,跟随杜克海姆或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卡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包括1908年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的列宁,都对黑格尔哲学不予重视,或者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偏见;最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的态度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观,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而这不是偶然的<sup>③</sup>。

所以在这里,实证主义既以黑格尔为敌,也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趣》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尔库塞,既要捍卫作为革命的、批判的黑格尔,也要捍卫作为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的理论武器,正是以否定性为核心的黑格尔辩证法。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辩证法意味它并不相信事实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因而在这—点上,辩证法从实质上是对其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观念在这—点上,辩证法从实质上是一个非批判性的概念。因此,与孔德和杜克海姆不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学最终走向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马尔库塞的观点,在黑格尔的许多早期手稿中,可以发现他对工业主义与劳动的批判中,与后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与劳动的批判,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尔库塞写道,“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倾向……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所吸收与延续。”<sup>④</sup>

在我看来,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的强调是相当独特的。一方面,它有别于那些保守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后者更倾向于强调黑格尔哲学中“调和”与“中介”的范畴,如卡尔·洛维特;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其他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范畴的强调。

在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中,马尔库塞也与其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不同,后者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部手稿中最重要的“异化劳动”的概念,而马尔库塞则是把它看作是马克思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换言之,他是从社会学的维度来考察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的。以马尔库塞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虚假关系,因而,作为克服异化劳动的手段,废除私有财产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马尔库塞强调,这只能被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认为,如果不能有

<sup>③</sup> Goldmann, Lucien, *Cultural Creativity* (St. Louis: Telos, 1976), pp. 112-113.

<sup>④</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252.

助于自由个性的发展与满足,那么,即便废除了私有制度,异化依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他写道:“必须避免使‘社会’再次成为对个体的抽象反对”<sup>①</sup>。以我的观点,在这里,马尔库塞显然注意到了作为抽象概念的“社会”对现实存在的个体的统治,这正是孔德他们所追求的“作为独立科学的”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条件下,非批判性地接受“异化劳动”的既成事实,因而从根本上不能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社会理论而洞穿资本主义对人的否定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在这里,马尔库塞也非常含蓄地对斯大林俄国提出了批评。总之,马尔库塞创造性地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理解为一个起源于经济关系的社会学的概念,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令人为之瞩目。

在《理性与革命》的最后,针对人们对黑格尔的指控——黑格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先驱,马尔库塞争辩说,纳粹的意识形态者,并没有紧跟黑格尔,而是把他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引用了卡尔·施密特(马尔库塞称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一句话作结:施密特写道,在希特勒攫取权力的那一天,“可以说,黑格尔死了”<sup>②</sup>。

## 二、《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思想的变化:从1941年到1960年

在1954年,马尔库塞为《理性革命》增写了一个“跋”,1960年,又增加了一个“序言”:关于辩证法的笔记。以我的观点,这两次的增写,反映了马尔库塞思想上的变化,即从早期的乐观主义与乌托邦中挣扎出来,放弃了1941年《理性与革命》的文本中的某些思想,逐渐走向了悲观主义。这种思想上的变化,马尔库塞自己也坦承,他写道:“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溃败并没有使极权主义的思想情绪消散,除了在思想领域之外,在现实社会中自由也在退隐。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马克思的理性观念,都远远没有在现实中得以实现。”<sup>③</sup>

马尔库塞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与“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是相呼应的。以福斯泰夫主义政策为导向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向了福利国家的道路,阶级对抗与资本的对抗不再以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为症候,而代之以相互妥协与调和,共同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之中。马尔库塞写道,“晚期的

工业文明”能够转化工人阶级的条件与精神面貌,能够“吸收其否定性”<sup>④</sup>。在1941年,辩证理性还充满希望,看上去还存在着作为一种革命的哲学来指导工人阶级的行动以在实践中克服异化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可是在1954年,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种可能性与灵感,仅仅是乌托邦的了,而即便是在乌托邦的形式中,作为辩证法概念的理性与自由也仍是遥不可及的,这一点可以从实践中无处不存在的反对自由观念的社会力量这一状况中得到印证。

在马尔库塞看来,作为否定性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以“自由原则”为基础批判了现存的世界,并最后达到了“纯粹思想王国、绝对观念”的自由<sup>⑤</sup>。然而在1960年,马尔库塞问道,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当否定思想的力量在现实中被消除的时候?当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在现时代的技术政治中横行无阻的时候?马尔库塞唯有仰天长叹:否定性,实质上从哲学与社会理论中已经被消除;也许,我们能在别的地方发现否定性吧,例如,在“诗的语言”和“先锋文学”中<sup>⑥</sup>。马尔库塞最终走向了对工业与技术统治的社会之“大拒绝”(Great Refusal)<sup>⑦</sup>。以我的观点,这种“大拒绝”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后的逻辑结论是一致的:除了诗学和美学的救赎之外,别无他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最后都告别了激进的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在1968年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的风暴过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风云不再。

## 三、不同时代的学者对《理性与革命》的批评

在美国,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一直占据着理论界的主流。当1941年《理性与革命》问世之时,在书中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毫无保留的批判,可想而知,这本书会受到美国学者怎样猛烈的抨击了。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实用主义者悉尼·胡克,那时他仍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使胡克感到愤怒的不仅是马尔库塞把黑格尔作为一个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家来捍卫,而且是马尔库塞攻击实证主义本质是保守的。在《新理想国》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胡克指责马尔库塞没有解释清楚为何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反对“科学的方法”——即实证主义的。在他对实证主义的捍卫中,胡克写道:“实证主义者能够是、而且从来都是革命者,恰如

<sup>①</sup>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23.

<sup>②</sup> *Ibid.*, p. 419.

<sup>③</sup> Marcuse, Herbert, “Epilogue” in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54), p. 433.

<sup>④</sup> Marcuse, Herbert, “Epilogue” in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54), p. 437.

<sup>⑤</sup> Marcuse, Herbert, “A Note on the Dialectic” in *Reason and Revolution* (Boston: Beacon, 1960), p. ix.

<sup>⑥</sup> *Ibid.*, p. ix.

<sup>⑦</sup> *Ibid.*, p. ix.

辩证学家能够是、而且从来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空谈者一样。”他同时也坚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表明了“黑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sup>①</sup>。

在胡克的评论中，他没有提及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或是马尔库塞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讨论。在我看来，胡克的评论更多的是为批评黑格尔而不是与马尔库塞的观点作实质上的讨论。美国左派的另一份刊物《科学与社会学》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佛农·J·麦克吉尔(Vernon J. McGill)的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中，他也与胡克一样捍卫实证主义是科学的、因而也是革命的，而马尔库塞对青年马克思的开拓性讨论则被忽视了<sup>②</sup>。

《理性与革命》一书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所受的评论要友好得多。政治理论家乔治·萨宾(George Sabine)称马尔库塞的书是“英语中研究黑格尔的最好成果”。萨宾也强烈认同马尔库塞的观点，即在黑格尔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无关联，并说道：“黑格尔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性主义的，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理性主义的。”<sup>③</sup>然而，在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上，连萨宾这样温和的人也表示了强烈的异议。

在美国学者的这些早期评论中，最为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到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长篇讨论，即便马尔库塞在此书中第一次为美国知识界介绍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都没有引起美国马克思主义知识界的注意。

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马尔库塞在国际上声名鹊起时，出现了从各个方面对他的著作的严厉批评。许多评论集中在他晚期的著作，例如《单向度的人》(1964年)，但也涉及《理性与革命》。在这里，我主要提及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对《理性与革命》一书的评论：反黑格尔的意大利哲学家吕西欧·科莱蒂，美国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以及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雷娅·杜娜叶夫斯卡娅。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科莱蒂发表了两本主要著作批判马尔库塞。作为批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部分，这些著作在意大利广受欢迎。在一篇题为“从黑格尔到马尔库塞”的文章中，科莱蒂所谈及的主题与1941年的胡克有些相似。他从“科学的”观点批判黑格尔和马尔库塞。依据科莱蒂，马尔库塞采纳了黑格尔的“对世界的消除”的这一意义上的“否定性”的解释，从而创立了一种

<sup>①</sup> Hook, Sidney,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Republic*, 105 (July 21, 1941): 90-91.

<sup>②</sup> McGill, Vernon J.,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Ives' Philosophy," *Science & Society* (1942) 6 (2): 150-163.

<sup>③</sup> Sabine, George, "Review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2) 48 (2): 258-259.

总体反抗的哲学来反对人类的实存。科莱蒂把这种“反抗”与他所认为的黑格尔的“对有限与尘世世界的陈腐精神之蔑视”联系起来<sup>④</sup>。然而，这样一来，他便忽视了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的一个有力观点，即黑格尔的哲学比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更富于历史性的基础，因而离马克思更近。与此同时，科莱蒂还抨击了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称之为“对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反应”<sup>⑤</sup>。在他看来，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一种对科学与技术的歧视性攻击”<sup>⑥</sup>。科莱蒂试图把这种对科学与实证主义的攻击与萨特的对物质世界的“恶心的”概念联系起来，以便得出马尔库塞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而是“承袭了海德格尔的传统”这一结论来。其实，正是科莱蒂自己的这种反黑格尔主义，最终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凯尔纳是至今为止研究马尔库塞最为彻底的美国理论家。在凯尔纳看来，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的深刻解释，肯定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激进成分”，给我们以“一种对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有力批判”<sup>⑦</sup>。以凯尔纳的观点，与马尔库塞“晚期对无产阶级的质疑”相反，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明显是“正统的”，此时的他仍把工人阶级当作是资本主义的现存否定性<sup>⑧</sup>。我赞同凯尔纳的观点，即《理性与革命》中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从1940年之后已经被有意地修正。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是既过于黑格尔主义的文过于正统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又该如何弥补的呢？我认为在凯尔纳的批判中，他很少关注马尔库塞在1941年对黑格尔究竟做了怎样的研究。他试图让马尔库塞著作中对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掩盖其他主题。

1991年，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新版的序言中，凯尔纳第一次讨论了新发现的社变迁理论的某些手稿。它们的作者是马尔库塞以及随后的批判理论家弗兰茨·绍曼，这些手稿几乎是在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及绍曼的《巨兽》出版之后就有的了，它们是对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凯尔纳写道，这些手稿表明“典型的马尔库塞式的倾向，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共有的倾向，即整合哲学、社会理论与政治学”<sup>⑨</sup>。他进一步论说，《理性与革命》与批判理论

<sup>④</sup> Calhoun, Lucia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 130.

<sup>⑤</sup> *Ibid.*, p. 131.

<sup>⑥</sup> *Ibid.*, p. 135.

<sup>⑦</sup> Kellner, Douglas, *Hed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33.

<sup>⑧</sup> *Ibid.*, p. 143.

<sup>⑨</sup> Marcuse, Herbert, 1991,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1991), p. xxi.

的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有联系，即反对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发展而来的对西方文明的单一的“哲学的一文化的分析”<sup>①</sup>。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理性与革命》具有抽象的和哲学的特点，但是很明显，它也为对社会变迁的更为经验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马尔库塞的著作的更为准确的梳理，来自于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雷娜·杜娜叶夫斯卡娅。她对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的兴趣始于20世纪40年代，不过她直到1987年去世都一直在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杜娜叶夫斯卡娅写道，在1941年末，她“读了一本新书，赫伯特·马尔库塞写的《理性与革命》。对第一部分论及黑格尔的章节我不甚了了，但第二部分论及马克思的早期手稿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sup>②</sup>。在她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马尔库塞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批评性的序言）一书中，她把《理性与革命》描述成“一部真正先锋的和深刻的著作”，“我很乐意承认我从中受益良多”<sup>③</sup>。

像马尔库塞一样，杜娜叶夫斯卡娅试图批判性的使用黑格尔的“绝对”，这个范畴正是其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极力要回避或消除的。对于杜娜叶夫斯卡娅来说，黑格尔的绝对并非一个封闭的总体性，而是“绝对的否定性”的来源；从这个来源中可以建构起一个激进的辩证法概念，它将拓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观点，从而把黑人、妇女和青年的等等新的社会运动容纳进来。

在杜娜叶夫斯卡娅看来，在1960年，马尔库塞不仅放弃了作为主体的工人阶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根本上放弃了他早期的关于辩证理性的观点。杜娜叶夫斯卡娅说，把反抗现存社会关系的先锋艺术的“大拒绝”作为核心策略，实质上是远离了从1941年原初的《理性与革命》的文本中所持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了强调她所认为的马尔库塞思想中最激进的核心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相反，在她对《单向度的人》一书的评论中，她拟了个标题“理性与革命 vs. 驯从与技术”。其实，在我看来，杜娜叶夫斯卡娅对1960年“序言”的抨击也就意味着对1941年文本的热烈赞美。这也正是杜娜叶夫斯卡娅与马尔库塞分歧的一个缩影。

#### 四、小结：《理性与革命》的理论意义

有一段时间，在激进社会理论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观点的激辩，一面是哈贝

马斯对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的捍卫，另一面是福柯与后现代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屈主义辩证法的抨击。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对作为批判的、理性的从而是激进的视角下的辩证法的捍卫。

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马尔库塞被问道：“黑格尔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否定的。以我的观点，马尔库塞至死都仍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忽视马尔库塞从1941年的《理性与革命》的文本到1960年“序言”的辩证法概念的实质变化也是不正确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开拓性的研究，他的这种左派激进的解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化了的人类关系下，为现代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种激进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案。对于仍处在启蒙框架之下的现代西方社会来说，这种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案并不完全是乌托邦的；至少，它仍然深信理性与自由对处于物化困境的人们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终极方向。

译者简介：蒙木桂，女，1977年生，广西横县人，汉族，哲学博士，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师，研究方向为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佛学。本论文的翻译工作得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的支持。

（本文责任编辑：陈婧）

① Marcuse, Herbert. 1991.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1991), p. xxii.  
② 1981E. *Rays Dunayevskaya Collection* (microfil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p. 13936.  
③ Dunayevskaya, Raya.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49.